

【名家背影】

□智效民

陈焕镛—— 生物学界的“周作人”

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,就好像忠孝不能两全一样,经过反复思考,他作出了牺牲个人名节、保护科研资料的选择。

陈焕镛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。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宦人家。父亲陈霭庭早年在香港创办《华字日报》,与启蒙思想家王韬有过合作关系,后来因精通英语、熟悉洋务,被清政府派到古巴担任总领事。在古巴,已经有一妻三妾的陈霭庭又娶了当地的一位西班牙后裔的女子。二人共有三男一女,陈焕镛就是其中一个。

陈焕镛14岁那年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去美国读书。高中毕业后,他先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立农学院、纽约州立雪城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森林学、昆虫学等专业,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农学硕士学位。大学期间,他了解到中国珍稀植物的标本大多保存在欧美等国,以至于要研究中国植物就必须远渡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。为此,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立刻回到中国,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。

回国以后,陈焕镛首先去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。五指山虽然有丰富的物种资源,却是一个人迹罕至、瘴气弥漫的地方。当时的海南岛对于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“未开垦的处女地”,因此陈焕镛被誉为第一个到海南岛工作的科学家。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,他曾经摔伤手腕并感染了恶性疟疾。最后,他因为遍体鳞伤、左手肿胀,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。

康复之后,陈焕镛把他在海南岛采集到的标本包装好,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,准备运往波士顿做进一步整理研究。不幸的是,由于这个仓库失火,他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也被烧毁。因此他原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顿的想法随之取消。

1920年以后,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,于是他把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复份运到南京,保存在东南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内。不料该标本室所在的大楼在1923年意外失火,致使这些标本化为灰烬。至此,陈焕镛在海南岛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标本全部被大火吞没。

当时的东南大学,在文科方面是学衡派的天下,在理科方面也是人才济济。其中仅生物学方面,就有秉志、钱崇澍、胡先骕和陈焕镛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。这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,都是求之不



陈焕镛

得的理想环境。然而,好景不长。1925年,东南大学发生“易长风波”,致使许多教授纷纷离去。1926年,陈焕镛向校方告假一年,返回香港度假。第二年,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,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。随后,他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,下设标本室、图书馆和植物园等机构,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。紧接着,他把采集标本的范围从广东扩展到广西、四川、湖北、贵州等地。

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,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。在此期间,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,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,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。

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一进程。由于战争来得过于突然,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、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,都因为缺乏准备,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,就是被战火焚毁。陈焕镛得知这种情况后,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,就把农林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,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

里面。

迁港之后,农林植物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,获得“国际声誉日隆”的美誉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,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,(只)因地方狭小、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,(这)让陈焕镛倍感抱歉。”(胡宗刚《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》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)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香港被日军占领,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所是“重庆敌产”,遂遭日军搜查,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、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。因此,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,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正在这时,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,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所搬回广州,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。为此,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,决定迁回广州。对于这件事,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,当时陈所长表示:“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质设法脱离日寇掌握,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,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。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,作最后挣扎。所中同人,有愿留者则听之,但须准备杀头处分;不愿留者,设法筹集川资,送返内地。”

由此可见,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:困守香港,所中标本很可能会被日寇掠夺;返回广州,标本虽然能够保存,自己则会背上汉奸的罪名。就好像忠孝不能两全一样,经过反复思考,他作出了牺牲个人名节、保护科研资料的选择。

陈焕镛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组评议员。他附逆之后,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会上提出“陈评议员焕镛赴广州附逆,应请开除会籍”的动议。最后,中央研究院作出了开除其评议员资格的决议。

抗战胜利后,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。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,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,也承担了保护北大财产的任务。不同的是,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,而陈焕镛却获得“不予起诉”的结论。这是否反映了大家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?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、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)

京剧《霸王别姬》以美的心灵、美的扮相、美的歌舞著称,它把一对英雄美人的生死诀别演绎得惊心动魄、凄壮无比,让人透过楚汉相争、垓下之战的历史烟云,体味到英雄末路、美人殒命的悲凉。全剧共九场,现舞台上常演“别姬”一场,而仍以《霸王别姬》冠名。

“别姬”这场戏从楚霸王项羽战败回营演起。他“枪挑汉营数员上将,怎奈敌众我寡,难以取胜”,只得退回营帐,郁闷焦躁,见到虞姬,心中觉得愧疚。虞姬见状,急忙上前询问:“今日出战,胜负如何?”“大王身体困倦,到帐中歇息片时如何?”“备得有酒,与大王消解郁闷如何?”一连几个“如何”,语气凄楚温存,表现出对霸王王王深情关爱。待霸王入帐安睡,她持灯到帐外巡

【菊园茶座】

末路英雄 美人血

□王庆新

视,只见帐外“云敛晴空,冰轮乍涌,好一派清秋光景”,若非身陷重围、危机四伏,这夜色该多么值得流连!无奈眼前却是狼藉之状,四野传来悲叹之声,虞姬满腹愁绪禁不住流露出来,唱起那段著名的《南梆子》: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,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。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,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”,用舒展的节奏和高亢的唱腔突出一个“愁”字,在悲壮的旋律中显示出庄产之美。

随后,虞姬就听到了楚军更夫流露离散之心的“闲谈议论”和汉军营内传来的楚国歌声,感到局势严重,急忙唤醒霸王相告。霸王着人去探,回报确是四面楚歌,他误以为“刘邦已得楚地”,发出了“孤大势去矣”的浩叹。携虞姬突围,势所不能;舍虞姬而去,于心何忍?他不由得叱咤呜咽,唱起了著名的“垓下歌”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,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?”他本是勇猛无敌的英雄,想不到一朝失手就深陷困局,走到了人生尽头。自己死不足惜,让他痛心的是把自己的爱姬也拖到了生命的末路。这四句唱韵味醇厚,哀怨动人,催人泪下。唱完,他握住虞姬的手深情凝视,继而与她相拥而泣,那神情、那造型充满雕塑之美。

虞姬又何尝不明白,他们生离死别的时刻到了,却表现出惊人的镇定。她强忍悲痛,提出要“歌舞一回”为霸王解忧。这里的歌,是虞姬的另一著名唱段《西皮二六》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”;这里的舞,是虞姬拔剑随歌而挥的“剑舞”。在意境深远的《夜深沉》曲牌的伴奏下,虞姬且歌且舞,表达了复杂的思想情感。面对项羽时,她自我克制,强作笑颜;背对项羽、面向观众时,才流露出内心的悲痛。开头,她的歌舞是为了替霸王解忧,歌着舞着,就暗自下定决心不连累霸王,以利他放手一搏,有了与之诀别的意味。这一番歌舞,舞蹈和音乐配合得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,铺洒了满台的惆怅!

正歌舞间,太监听来报,八千子弟兵俱已散尽,虞姬的悲痛再也抑制不住,她盯着霸王的佩剑,一字一顿地说:“愿乞君王腰间三尺宝剑,自刎于前,以报深恩,以免大王悬念。”霸王急忙劝阻,虞姬悲愤地呼喊:“大王啊!”这一声呼喊,犹如山猿哀鸣,杜鹃啼血。接着她长歌当哭:“汉兵已略地,四面楚歌声;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!”直唱得声带哽咽,悲痛欲绝。唱罢,趁霸王不备,拔其腰间剑自刎,倒在霸王的怀抱中。

虞姬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。她清纯亮丽,庄重静婉,远见卓识,机智坚强,在危难时刻的表现似乎比霸王还要略胜一筹。最终,她以丈夫的利剑自刎,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命运的激烈抗争和对丈夫的无限忠诚。剧中的霸王虽犯了骄傲自满、刚愎自用的错误,但他身经百战,威猛无比,为推翻暴秦立下过赫赫战功。他孤高明净、磊落豪迈,身临绝境还深情眷恋着他的爱姬和宝马,堪称铁骨柔情。中国人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,项羽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,但是赢得了一份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一份经久不衰的敬重,他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。

(本文作者著有《京剧优秀剧目欣赏》一书)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傅国涌

只要这些“少数人”有知识也有能力,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,他们有百折不回的决心、拔山蹈海的勇气,就可以扭转风气,转换时代的精神。

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,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个观点——少数人的责任。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:“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,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,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,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,是因为‘少数人’没有责任心,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。”这个“少数人”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,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、成为一种势力的人,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,国家的中流砥柱。他心目中少数优秀的分子,包括他本人、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,他们有知识、有智慧、有能力,改变社会是他们“少数人”的天然责任。在专业领域之外,他倡导“少数人”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,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。他认为,无论世道多么的浑浊、多么的可恶,只要这些“少数人”有知识也有能力,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,他们有百折不回的决心、拔山蹈海的勇气,就可以扭转风气,转换时代的精神。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,无论时局变幻,政权更迭,外患日深,他的这个观点都没有改变过。

1933年1月,中国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日本对华北领土的覬覦,丁文江在他们“少数人”办的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表《假如我是蒋介石》一文,指出:“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。任何国家,无论环境如何困难,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。”他希

望认清这样的事实:一,日本是得寸进尺的,它要实现所谓的“全亚洲”主义或“亚洲门罗主义”,决不是割一小块土地,就能保全一大块土地。二,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,它要吞并整个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。我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抗,要让日本付出最高的代价,而不是拱手相让。三,无论我们如何抵抗,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计划。我们要生存,当然要靠国际的均势,但是先要自己肯牺牲,有牺牲的办法,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援助。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,希望别国的人来替我们抵抗,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便宜的事?如果他这三点是对的,主张抵抗就不是一种高调,而是最低的低调,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,而是从十分的理智出发的,不是谋自杀,而是图生存。有了认识,才会有决心;有决心,才可能找到办法。要提出具体的办法,不但要清楚许多未公布的事实,而且要了解军政权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,否则,空言办法也不可能真的实行。国家虽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国家,抵抗也不是蒋一个人的工作,但因为蒋的特殊地位,其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。他说,假如自己是蒋介石,他的办法有三条:

第一,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。“假如我是蒋介石,我一定立刻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,用极诚恳的忏悔

态度,请胡到南京。天下惟诚可以动人,何况在现在的情形之下。”

第二,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,与曾经反蒋的阎锡山、冯玉祥等人达成谅解。

第三,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,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。”

“以上三件事事实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,虽然没有把握,但是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,是应该要做的,做到十分,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;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……”

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这四五年间,蒋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脱这三条的范围。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,一个有训练、有创造力的学者,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,要承担起“少数人”的责任,并不是自己直接去从政、担当领袖角色,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见识、学养,提出应对危机的办法,不管当局者能不能接受。我最喜欢的是丁文江“假如我是蒋介石”这个句式,在此之前,丁文江曾发表过一篇《假如我是张学良》的文章。那个时代,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,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,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。

(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,著有《追寻失去的传统》等书)

丁文江：“假如我是蒋介石”